

第六章 合浦出土的金银、宝玉石串饰与微雕

三、从南海到长安

在历史时期里，汉帝国的贸易是最引人瞩目的，不仅交通范围得以扩张，其辉煌业绩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鉴于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宗向北，其指向某种程度上是与草原马背上的民族军事冲突的副产品，文化交流的同时，互通有无的“边境贸易”始终穿插其间。^[38] 马背上的民族广泛喜爱金银装饰，而各种艳丽的半宝石串饰又点缀其间，在审美上深刻影响到农耕民族。

在中国商代及西周的高等级墓葬里，首先出现红玉髓的珠串，进而在西周玉组佩里大规模使用起来。不少研究表明，这类红玉髓的装饰品应是通过草原丝路与来自中南半岛的间接贸易成果^[39]。东周时期风靡于中原各国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最早的制作也是仿制西亚的玻璃珠，当然从其最初在齐鲁一带发现来看，间接地通过沿海贸易的原因不可忽视，之后占据广袤的南方楚国在域内大量制作，江汉地区和湖湘地区成为此时中国的琉璃制作中心。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地区零星发现的蚀刻玉髓珠，也表明在早于秦汉帝国实际控制岭南之时，半宝石串饰的贸易交流网已经以断断续续的模式或者间接模式存在了。

各类珠饰和微雕在中国内大规模出现，从发现情况来看主要是始于两汉中期之后。可以想象，在汉帝国实际控制南方诸郡的同时，通过零星的南北方贸易，形成了中原内地贵族对南方异域珍奇的供需关系。这种关系在早期南越国时期可以说是逐步和间接的，但置于统一帝国的贸易交通网络下，追求时尚之风就非常急速地席卷内地。从南至北，这在帝国内重要城市周边的高级墓葬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时间横跨两汉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一）内地的串饰与微雕

汉帝国时期内陆的串饰与微雕的出现大体有以下几个阶段。汉初，高等级墓葬里始见少量蓝色玻璃串饰件和零星的玛瑙串饰；从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内陆显贵者墓葬里的串饰数量开始稳步增加（南越墓葬不在宏观的统计中），在武帝中后期微雕饰品出现在串饰中；随着南部贸易繁盛，进入内陆的串饰与微雕稳步发展，步入西汉末年至新莽，达到其风靡的鼎盛阶段。

与东周频繁所见的费昂斯珠不同，狭义的玻璃珠在内陆的发现并不多。在江苏仪征庙山（据信是汉初吴王刘濞陵墓）的一座女性陪葬墓中，出土有蓝色玻璃，时代为西汉早期。^[40] 西汉初期刘濞的吴国富饶，国都广陵位于长江入海口，可便捷通过海路与闽越、南越贸易，蓝色玻璃原料来自与南部间接的商贸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湖南的一座长沙国王后墓葬里，一批宝石、玻璃串饰、玻璃器被发现，其中有水晶

玛瑙珠 24 件、琉璃鼻塞 1 对、蓝色玻璃环 1 件，时代相当于汉景帝至武帝早期。^[41] 此后，与之相似的串饰于内陆频现。如武帝晚期到昭帝时期的中山王刘胜与王后窦绾的墓葬里，随葬串饰见有水晶、玛瑙圆珠、玉质的微雕及珍珠百余颗。^[42] 昭宣时期的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群，黄土山为梁王王后墓，出土各式大小的水晶、玛瑙串饰和软玉微雕（图 6-16）。^[43] 近乎同时，被认为是燕王或广阳王王后的北京大葆台汉墓发现玛瑙珠、琥珀珠以及玉质微雕几十颗。^[44]



图 6-16 河南永城黄土山汉墓出土的串饰与微雕

帝国京畿地区，相对函谷关以东而言，其出现的时代略晚。目前最早的墓葬如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从位置看似为汉武帝茂陵陪葬墓，时代为西汉中晚期，墓中出土水晶、玛瑙、松石珠和玻璃管若干，另有玉质、琥珀各类造型的微雕饰件（图 6-1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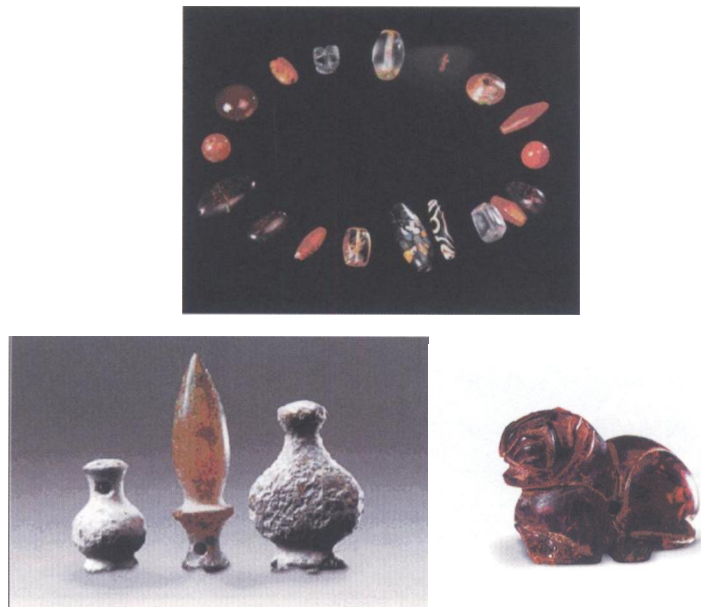


图 6-17 陕西咸阳马泉汉墓出土的串饰与微雕

此时帝国南部的广陵（今扬州），是迄今为止除南部沿海以外，串饰与微雕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域。如著名的甘泉姚庄 M101、西湖胡场 M14^[46, 47]，皆属西汉晚期（图 6-18）。发

现串饰的墓葬主人也并非此前的高等级贵族，从其随葬品分析，串饰的新受用者当是地方贵族或富贵豪强，受用者也大体以女性为主体。广陵地区串饰与微雕的集中，应得益于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经济基础。



a. 扬州甘泉姚庄 M101 出土



b. 扬州西湖胡场 M14 出土

图 6-18 江苏扬州出土的串饰与微雕

在帝国中心，陕西张安世家族 M1 的女性墓主（可能是张安世的儿媳辈）左手腕部发现一组由各类玉石琢制的虎、鸟禽、珠、三角形坠组合的手串。此时，最重要的是在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里出现了新型微雕种类——玉连胜^[48]，显示出内陆与南部边陲口岸间流行风尚的快速互动。

处于中南部的长沙地区，西汉晚期到新莽时，微雕继之早已流行于此的串饰出现，且频繁发现，以长沙王家族墓群发现最集中。如长沙望城风蓬岭西汉晚期某代长沙王后墓，棺内见有淡蓝色、黄色水晶珠（绿柱石？）若干^[49]；岳麓与望城交界的谷山西汉晚期长沙王墓中也见有淡蓝色的水晶（或为绿柱石）长管和珠饰、酒红色透明琥珀微雕（图 16-19）^[5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透明的宝石管、珠搭配琥珀的组合风格，近年在西汉中晚期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中重新得以证实，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内地特有的串佩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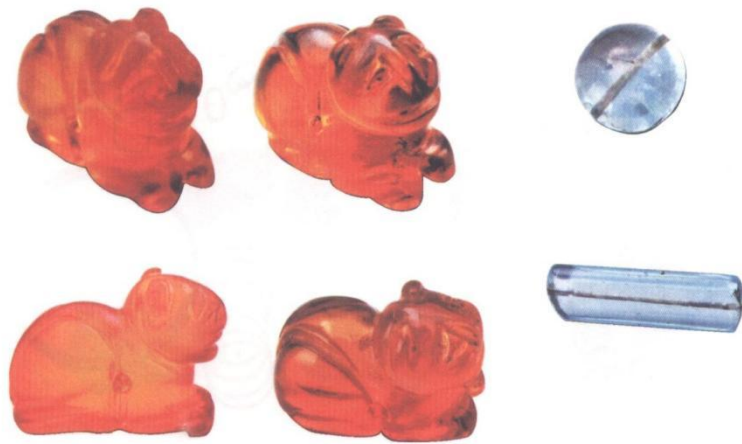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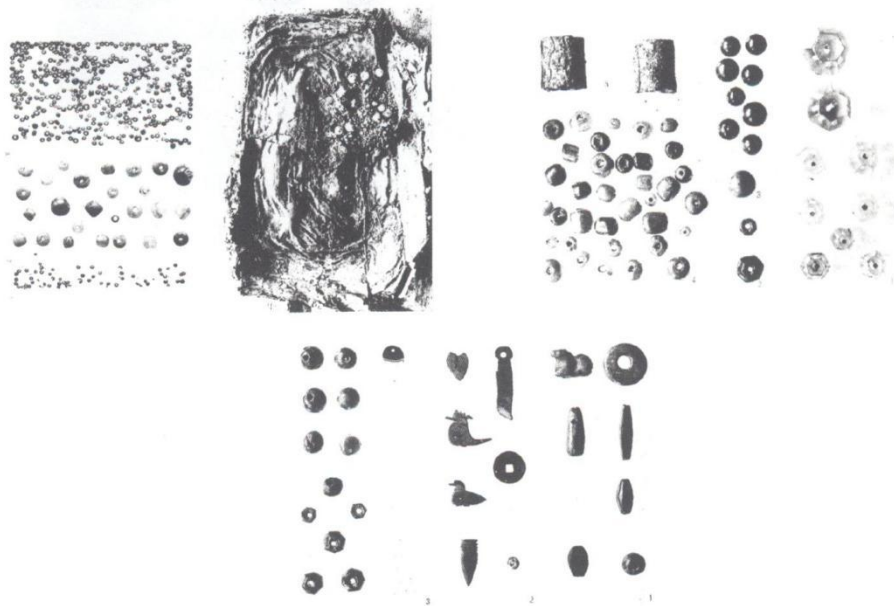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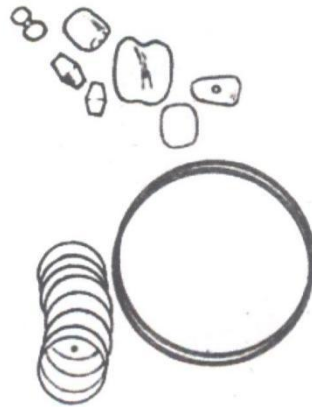


图 6-19 湖南长沙谷山长沙王家族墓出土的串饰与微雕

汉乐浪郡远在东部边陲，西汉中期后纳入帝国中央的管辖。在乐浪郡治梧野里 M20、石岩里 M9 中的发现情况表明，各类珠饰如合浦出土的以漆匣贮藏在一起，宝石串饰与微雕也常见集中出土于女性右手腕部（图 6-20）。^[51, 52]串饰与微雕还发现在蒙古草原的诺彦乌拉、都日勒格那日等匈奴高级贵族墓地，时代相当于两汉之交^[53, 54]及东汉中的晚期的准格尔旗西沟畔南匈奴墓地^[55, 56]（图 6-21:a）。在 1 世纪前后的中亚阿富汗“黄金之丘”（Tillya Tepe）墓葬，于 M5 中出土 1 件琥珀卧兽微雕，即使因长期佩戴表面磨损严重，却也能看出其与中国内地西汉末年的微雕如出一辙（图 6-21:b）。同墓地（M3）还出土有连弧纹昭明镜铜镜，是西汉中晚期流行的典型样式。^[57]



a. 朝鲜梧野里 M20 漆匣及棺内出土的串饰与微雕
图 6-20 朝鲜半岛乐浪汉墓出土的串饰与微雕



b. 朝鲜石岩里 M9 棺内出土的串饰与微雕

续图 6-20



a. 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出土的串饰

b. 阿富汗“黄金之丘” M5 出土的琥珀微雕

图 6-21 匈奴地区的串饰及中亚所见的串饰与微雕

在中原短暂混乱后，进入东汉统一时期，串饰与微雕仍然集中发现在贵族墓葬中，不过玻璃珠延续了西汉晚期的逐渐向中下阶层的普及，宝石和半宝石串饰与微雕仍然是受高级贵族的青睐。主要表现在，取用质地优良原料的串饰与微雕无一例外地被发现于皇室的墓葬里。

近年，在基建过程中被严重破坏的安徽寿县阜陵王墓，属于东汉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事后征集的文物里就有青金石和绿松石串饰与微雕、水晶串珠若干，另有金质挂饰等（图 6-22）。徐州土山 M1 年代较寿县阜陵王墓稍晚，从出土物品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代彭城王王后，银缕玉衣内发现一组完整珠串，包括绿松石、琥珀、玛瑙和玉质串饰微雕，其中微雕颇为细致、动感十足（图 6-23）。^[58] 目前发现微雕最多的东汉墓葬是定县 M43 东汉墓，发掘者认为墓主是东汉中晚期的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中微雕数量众多，质地以绿松石和酒红色琥珀为主，以及搭配以玻璃、水晶、玛瑙的串饰。^[59] 江苏甘泉山 M2 因出土“广陵王玺”，而被认为与东汉晚期广陵王家族有关，墓中发现珍珠、玛瑙和贵金属多面

金珠，以及琥珀、玉质的微雕等。^[60]



图 6-22 安徽寿县东汉阜陵王墓出土的微雕与金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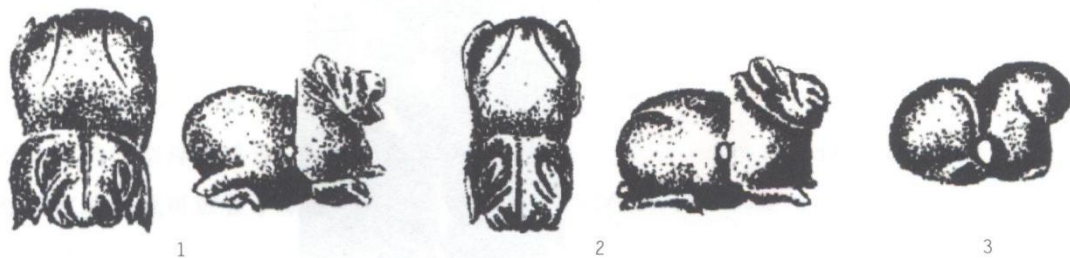
图 6-23 江苏徐州土山东汉彭城王家族墓出土的微雕

在东汉帝国的内陆核心地带，串饰尤其是类别和微雕造型极度一致，表明其风格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在南部中古，尤以长沙为主要集散地，包括对玻璃、肉红石髓珠、水晶（绿柱石）的大宗消费，酒红色不透明琥珀、多面焊接炸珠的金珠同样为数不少（图 6-24）。^[61, 62]从出土串饰数量、质料来看，湖南均是除帝国南部沿海以外最大的消费地，甚至可以说是内地重要的中转场所。另外，长江中下游以广陵为中心的地区的消费能力也不容小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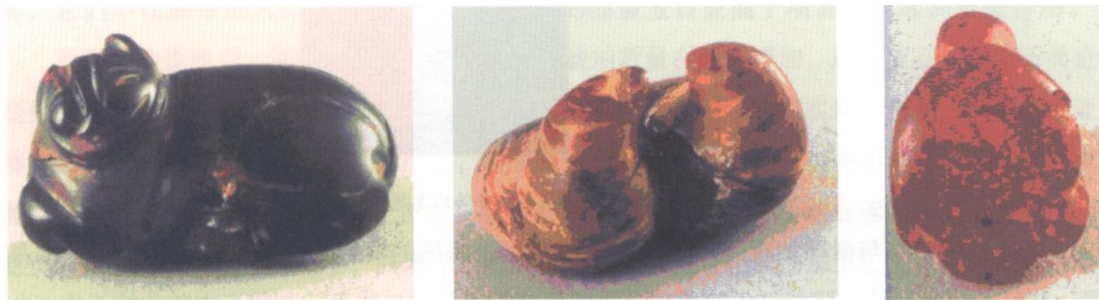


图 6-24 湖南汉墓出土的各类串饰

同时，西南边陲的广西、贵州东汉大中型贵族墓中，酒红色不透明的琥珀微雕卧兽占了大宗（图 6-25）。^[63,64] 相较而言，西北边陲则常见黝黑的煤精材质微雕以及少量的金红色琥珀雕，显示出原料来源的不同。金质的动物形微雕出现于东汉晚期长江中下游的孙吴疆域内，这或许是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 3 世纪前后关于“吴无刻玉工”的记载。^[65]



a. 贵州清镇平壩东汉墓出土的微雕



b. 贵州兴仁县交乐 M19 东汉墓出土的琥珀微雕

图 6-25 贵州出土的东汉微雕

（二）工艺与材质

两汉早期，江苏仪征庙山蓝色玻璃珽截面呈八角形且半透明状，置于头部附近。珽是自东周晚期流行在中原女性耳间的装饰物，至汉代依然流行。这对玻璃珽可能为进口原料，并在汉地铸造。

西汉中期前后，长沙曹巽墓出土的玛瑙水晶皆晶莹剔透、光泽莹润，蓝色玻璃环造型为典型传统的多台面的扁体环形，由于表面风化，已不能判别是琢制还是铸造的。中山国

王及王后墓中所见玛瑙珠呈透明的暗红色、乳白色，扁球形，一颗有棱；微雕见于王后墓，造型有蝉形、瓶型饰、花蕾形饰、连珠型饰等，均以乳白色软玉琢制。编穿方式按发掘者所见复原如下：玉舞人和玉蝉垂悬于中央，周围绕以设计成长尖花蕊、瓶、连珠等形状的珠管(图 6-26)。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玛瑙珠兼有红白两色，微雕亦为软玉质。串珠饰中主体为红色，中国西汉时期偏爱使用这种淡红色或深酒红色的玛瑙作为珠饰的原料。



图 6-26 满城 M2 汉墓窦绾串饰的复原图

京畿地区串饰与微雕始现，以咸阳马泉汉墓出土串饰的发现为代表。其以无色透明水晶管、暗红色玛瑙管珠、暗紫红色的琥珀微雕所代表的南方进口物品，与代表内陆传统玉作工艺的玉质微雕、传统丝路的蚀刻、搅花琉璃珠同出，昭示了陆、海两条丝路在长安的交会，意义重大。

内陆早期多见的玉质戟、斧（钺）是典型模仿兵器造型的微雕。其戟形似西汉的“卜”字形戟，中分开叉，一端横短、另一端弧长，外侧尖薄以表示刃部。斧（钺）更加写实：弧凸的刃部，两端窄尖。西汉制度中，立黄钺于车驾以示威严。现实中，这两类兵器既可仪仗威严，亦可参与斩杀。仿造用于装饰者，与稍晚后世出现的“五兵佩”^[66]同样起到了庇佑女性的功用。西汉中期的串饰微雕均昭示着这些串饰的拥有者无疑都是西汉的顶级权贵。东方朔曾于汉武帝执政的晚期上书，描述宫掖内妇人多“簪璫瑁，垂珠玕”，认为奢靡之风应禁止。所言“垂珠玕”，可能即指配合着各类形态的微雕和串饰。^[67]

西汉晚期的串饰与微雕的特点，可以以扬州邗江姚庄墓为例：发现时散落于女性的头端，由 9 件串饰组成，其中玛瑙质的管珠 2 件，其余 7 件分别是琥珀质的“工”字形佩与鸟首壶形饰、煤精材质的羊与鸟、白玉质的壶形饰以及 2 件白玉连胜。又如，扬州西湖胡

场 M14 出土的串饰发现于女性的颈项部。较前者，其质料与造型上更是增添了玳瑁材质的鸡和鸟禽以及大小 2 件黄色偏红透明质的琥珀卧兽，尤其是搭配着金质嵌宝石壶型珠，更显出来自异邦的巧工与新兴的时尚，而利用玳瑁天然纹理来表现禽鸟与鸡的羽毛也可谓巧思。煤精材质开始出现在微雕当中。

又如长沙望城县长沙王家族 M7 中所见的琥珀卧兽，其与淡蓝色水晶（或为高纯度琉璃）管、珠搭配，彰显出有别于其他地区串饰的独特风情。长沙市近郊 M211 出土的微雕则有游禽状、伏兽、连胜诸形，也少不了水晶珠的构成。

从东汉早期一件嵌宝石鎏金铜樽盘上的铭文可知，东汉时人们将红色玛瑙称为“闵瑰”。^[68]相比西汉及新莽时期的宝石微雕而言，除保留诸如连胜、“工”字形佩之类的法器外，抽象简化的禽兽类装饰品，经过东汉早期的孕育，转变成比例匀称、写实动感与雕琢细腻的圆雕饰品。有关此类写实圆雕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汉开始在陵寝或宫阙前放置的大型神兽造像。随着汉帝国神道升仙学说的普及与推崇，到西汉中后期，它们又被等比缩小成可放置于案头的玉质圆雕，以方便祭祀膜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谶纬与升仙信仰极度流行的东汉时期，人们笃信经过一丝不苟雕琢的有翼神兽们是仙界代言者，它们不仅能帮助人们躲避不祥，而且各色的晶莹宝石更易于项首之间起到点缀作用。

东汉串饰质地中，绿松石和不透明的酒红色琥珀数量在明显增加，透明宝石、半宝石类造型更趋于随形和简单化。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宝石微雕在西汉晚期实现了自制，出现了中亚特有的青金石和绿松石料质的微雕产品，特别是青金石的普遍使用，表明中国自制串饰原料来源的多样性。^[69]微雕工艺的分化正在日益显著，皇室贵族掌握着精雕细琢的雕刻品，东汉普通贵族所佩用的微雕相对简单，其继承了西汉微雕依旧保持着粗犷的加工工艺，这很可能也是随着内地微雕的普及而需求量进一步增大，导致量产的商品化表现。

我们似可观察到东汉微雕上断续而又不紧密相连接的线状纹（表 6-1）。这是砣具琢制后才能留下的中间宽、两头尖窄的典型痕迹，在表现动物鬣毛或是禽鸟羽毛雕刻，存在断续的二次砣具琢磨修补，几次转角衔接痕依然明显。刻纹宽度与深度及刻纹槽旁无过多毛糙，加工的砣具并不宽厚，推测这或是由极薄的金属薄片所承担。某些刻纹痕迹颇深，这就类似快速的、薄片状砣具旋转后形成的痕迹现象。砣痕还可以表现出丰富而健壮的肌肉和较为细部的轮廓，汉代简练的“八刀”技法从痕迹学上的判断应该是这种技法的先河。进一步说，大砣具的运用成就了极为简练、表现动感和力度的雕刻技法，形成的宽大砣痕源自果断的力量表现。

表 6-1 西汉至六朝运用砣刻技术的微雕

参考图例	器物名称	出土、收藏地点	图片来源
	陕西宝鸡西汉墓	《陕西出土汉代玉器》	
	松石串饰	陕西西安曲江财政干校新莽墓	《陕西出土汉代玉器》
	青金石雕兽串饰	江苏徐州土山 M1	《法·老王》
	松石雕兽串饰	江苏徐州土山 M1	《法·老王》
	松石、琥珀雕兽串饰	江苏南京象山 M3	拍摄于南京市博物馆展厅
	玉兽串饰	江苏南京仙鹤观高氏家族墓	《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

通常情况下，纹饰的粗劣可能是玉工在设计与琢制上能力的欠缺，在此构图中不少的辅助性纹饰刻画浅显，这样痕迹可利用薄砣在不需施加更多压力下制造出来以外，徒手的刻画也不失是一个方便简易的做法，一些微雕卧兽表面布满短促的线条与小幅度来回磨蹭所造成的浅状磨痕。在构成主体纹饰的线条中，尚能分辨零星深、宽的“打稿”砣痕，这些看似“打稿”的痕迹将所需要表现纹饰的框架初步建构起来，细部则使用徒手反复刻画的技法制成。且此类方法使用在汉代刚卯、严卯文字刻画上，甚至到三国两晋时期依然采

用。在笔者看来，这也是西汉中晚期开始，外来的微雕成品或工艺与当时汉代玉雕细节工艺完美结合的结果。

（三）东亚内地的传播路线

目前中国内陆发现能确定的最早外来串饰品，是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墓(M1)所见的蚀刻玉髓管，其拥有者是女性，名孟滕姬，研究者推测她的身份是高级楚国贵族。这些管饰出土位置表明其是串联作为身体的装饰物。而这些串饰无论是制作技法，还是其长枣核状的器型，都显然有别于中国传统串珠的形态^[70]，最新的研究表明它们的产地是北印度大型城市^[71]。同类串饰在同时期或更早的内陆地区并未发现，有学者认为其来源最有可能来自南部或西南部地区的间接交流。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秦墓(M2)也出土有线形蚀刻肉红色珠饰，与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相同，有来自南部的间接传播的可能性。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对淅川下寺 M1 同出的蜻蜓眼玻璃珠的分析来看，自西亚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此条南北贸易的曲折道路，文献曾记载相当于春秋几百年之后的汉武帝时期有过使用。汉帝国在向西南扩张的同时，利用商人去西南部进行贸易，在此行动下，将整个西南区的道路重新描绘。^[72]事实上，当时中国与印度、大夏(Bactria)等之间的贸易交流过程，西南山区密林里的零散人群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著名的记载即是张骞回汉后对中亚巴克特里亚市场上出现蜀地邛杖的报告，并对存在已久的这条路线做了转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73]

当时对这条路线的认识只是源自大夏商人的转述，尔后的完全来自张骞本人的推测。目前，学界肯定这条印度通向蜀地西南道的存在，它沟通印度—缅甸—云南的路上贸易，而具体路径应该是由不同的族群以短路程所连接起来的间接交往路线。考古发现证明，滇池旁的古滇国通过此通道得到蚀刻串饰与蚀刻技术(图 6-27)。^[74]故而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汉武帝对西南部的扩张，亦是由于张骞对西汉时期或之前西南道的不确定的估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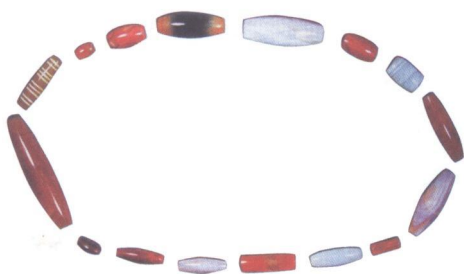


图 6-27 云南石寨山出土的古滇国串饰

在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之前，黄河、淮河流域内的中国交通系统已经非常发达，通衢各列国之间的道路带来的不仅是贸易的繁荣，更是在秦国的战车与铁骑通行下建立起统一的帝国。

秦帝国大规模增修道路，驰道的修建完整地构建起帝国有效的高速道路系统，当然它的最大功能是将皇帝的政令以最快速的方式传达至帝国的各个角落。通向中国南部的驰道是武关道的延伸，过长江后水陆并进抵达南海海滨。秦帝国在南部交通网的营建里，灵渠的水路系统无疑是最重要的节点设置，在其建成的早期军事目的十分凸显，帝国腹地的精锐通过水路源源不断输入岭南。此后南越国时期，与汉帝国关系的摇摆使得南越对灵渠的掌控无疑在于军事控制，贸易退居似乎并不重要的地位。西汉中期后，汉武帝并取南越，南部设南海、合浦、苍梧等诸郡，合浦郡辖合浦、朱卢、临允、高凉和徐闻五县，郡治合浦。合浦与灵渠所在苍梧郡同属交州刺史部。此时帝国的南部贸易乃至对外贸易中，灵渠发挥的重要作用才更综合地呈现出来。大体上来说，灵渠沟通了广西的漓江和湖南的湘江，从而使得南海运抵合浦、番禺（今广州）两大贸易集散地的国外货物，能够完全通过水路快速地运输到长江流域。

通过上文对两汉时期内地微雕的发现情况大体梳理，大致可以勾勒出它们从南方两广输入中原腹地的传播路线（图 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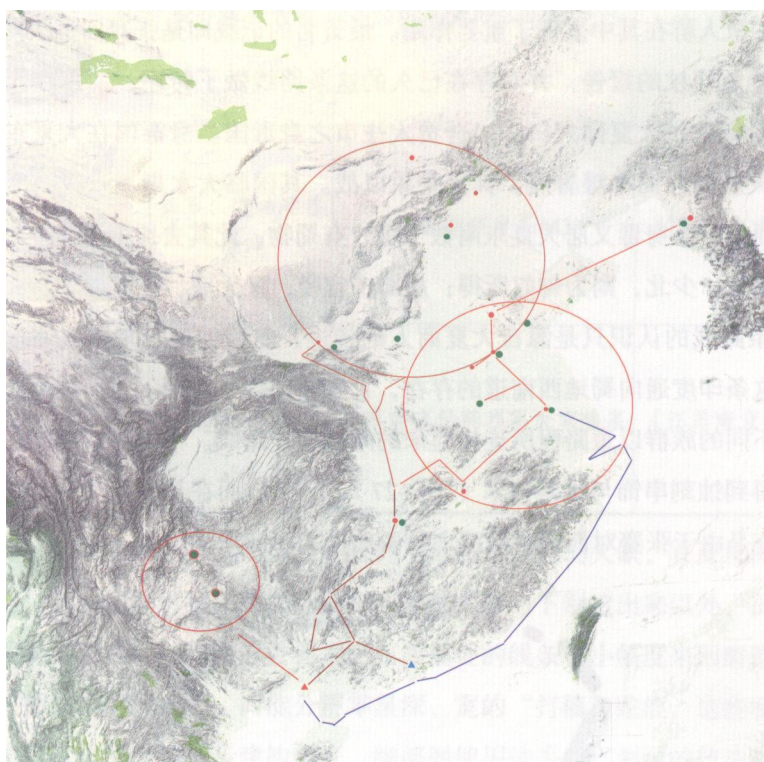


图 6-28 两汉时期南部串饰输入内陆路线示意图

深红色部分为南部内陆水路；橙红色部分为长江水路及中国东部、朝鲜半岛海路；棕色部分为汉江水路及中原陆路；蓝色部分为中国南部海路

1. 深红色路线

当海运贸易货物抵达合浦郡合浦县（今草鞋村汉城）后，经过商人们的分拣包装，再重新走向新的更为长远的贸易征程。由于中国南方崇山峻岭的阻碍，交通运输多利用水道进行。不过相对远绕东哑沿海的海路而言，安全系数远高于后者。如果单从贸易经济而言，商人们更希望直接参与到终级买卖当中，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更相信他们选择一条相对曲折却更加安全的古道：自合浦县登船沿南流江逆流而上，经朱卢县（今玉林市）转北流江而上，由于山地的阻挡，必须暂转陆路才抵达苍梧郡的郡治（今梧州市）。苍梧郡郡治苍梧县位于郁水（今浔江）与桂江交汇之地，上达西江，下注珠江，水运体系发达。货物在此重新上船，过猛陵逆郁水而上，过郁林郡的郡治布山县（今桂平市），逆流入潭水（今黔江、柳江）至潭中县（今柳州市），向西北入溶江（今清江），改行一段陆路抵始安县（今桂林）。另一条路线在苍梧县可取道漓水（今漓江）直上，抵始兴县。两条路线相比，前者虽水道漫长，沿途有郡治重镇，水势较缓；后者路径短直，沿途地理条件颇恶劣，人迹罕至。

至始安县的货物，标志着正式进入荆州刺史部管辖的零陵郡。从始安县继续沿漓水而上，至此已抵贸易路线上重要的节点——灵渠西口，通过灵渠的多级转运，货物已从珠江上游流域进入湘江的上游流域。同样，番禺的货物直接取道珠江，到苍梧县后同样向西或北，抵灵渠再转运至零陵郡。入湘水过零陵县，又至零陵郡郡治泉陵（今零陵）后，顺水而下，一路过酃县（今衡阳）抵帝国南部重镇长沙郡（国）都邑临湘（今长沙）。上文所论，湘江流域的故楚人族群和楚文化因素南扩，大体也是沿此路线反向流动至帝国的南部沿海。

通过科学的考古发现证明，临湘是串饰和微雕消费的内陆重镇。可以推测，有相当一部分货物在此经过了售卖和重新分拣，再进入下一个层级的传播销售。至此，顺利深入到内陆的商人们再次利用水利的便捷，他们从临湘城再一次出发，自湘江入洞庭云梦之泽，此处有两条通向内陆中心城邑的路线。

2. 棕色路线

该路线之一是关东诸郡和关中地区的道路。其沿江而上入云梦抵大江岸边的南郡江陵（今江陵）水陆并举过宜城（今宜城）、达重镇襄阳城（今襄阳）；或可入竟陵（今潜江），沿汉水而上抵襄阳。自襄阳分道，向关东诸郡的路线需向北，入南阳郡，沿清水（今白河）而上，过新野（今新野）到南阳郡郡治宛县（今南阳）。至此已完全进入平坦的中原内陆，陆路运输更加方便快捷。其向北可直达经济发达的司隶校尉部的弘农、颍川、河内等郡，向东可达物产丰饶的豫、兖、青、徐等州。另有一路自襄阳沿汉水干流而上，再入丹水，取故武关道抵秦岭南麓的上雒县（今商县），通过陆路转运至京畿地区。^[75]

3. 橙色路线

该路线是取长江水路顺流而下，抵达东部地区。沿长江干流而下，进入扬州刺史部所辖，途经豫章（今南昌）、庐江（今庐江）、最终到达广陵郡，吴郡与会稽郡也应在其商业辐射范围之内。汉帝国大多数的中心城市都是坐落在黄河、淮河以及长江沿岸或附近，沟通这些内陆河流贸易路网，相对于东部沿海水路而言更加安全。广陵郡周边河网密布，向北有中渚水通淮水（今淮河），以淮水向上可沟通九江郡寿春（今寿县）；淮水中道可取泗水抵东部徐州刺史部及梁、楚、齐、鲁等国。

当然，南部通往内陆的贸易道路中，可能还有从缅甸陆路再入蜀郡，再由汉中抵达长安的“身毒道”^[76]；或从番禺到长沙及豫章郡，同样也可从陆路通过桂阳郡（今广东韶关）进入湖南南部，再利用连接长江干流的水系进一步向内陆输送。

4. 蓝色路线

不能忽视的是，在陆路繁盛的同时，东汉时期（83年），来自交阯（今越南中北部）和其他临近郡县的物品开始从海路，途经今福建、浙江海岸抵达长江入海口，再逆江流而上，通过沿江的中心城市——最可能的即是广陵郡（今扬州），再转运至洛阳。广陵甘泉山据研究为东汉广陵王家族墓，其中M2汉墓中曾发现过罗马控制地中海沿岸时期的胶胎玻璃梳残件，其时代相当于1世纪前后^[77]，很有可能是通过海运抵达广陵。

关于这条路线，有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东汉政府努力改善水路和陆路交通，主要是受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所驱动。^[78]无论如何，这条被官方所选取的路线想必是一条相对成熟的海路。另外需要阐明的是，西汉中期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在海上航行的大型著名楼船，为此后海上交通工具建造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客观上的技术可能。^[79]从文献上的记载来看，这类船只具有非常巨大的运载能力。广州东汉墓曾发现多件陶质船只模型，清楚地显示：汉代的船头安置巨大的锚，船尾有舵，船身用16支桨作为动力。^[80]或许因为早期内陆路线需要逆流而上，越到上游，部分内河的水深与河宽无法满足支撑大型船只的航运条件，再通过陆路间接转运。而转运频繁带来运输成本和风险的增加，使得大宗的官方贸易品的运输转为更单一的海路运输。由此看来，造船技术的提高，让东汉帝国的南方贸易路线相比较西汉时期拓展了很多。

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船只沿线可能停靠的港口及港湾，如会稽郡（今绍兴）、吴郡（今苏州）、广陵郡（今扬州）等地，发现东汉时代的墓葬里都曾见过半宝石的红玉髓质地的耳珥饰、蓝色的琉璃串饰等，其料质和器型与在南部合浦、番禺（今广州）的所见完全一致。特别是西汉时期吴郡南部地区（主要是指杭州以南的宁绍地区一带），从西汉未曾发现串饰至东汉开始陆续出现，也展现出在海运多路线的拓展中，丰富了中国人的首饰物品。而此时的合浦郡，因合浦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墓地所见证明，此地除了作为域外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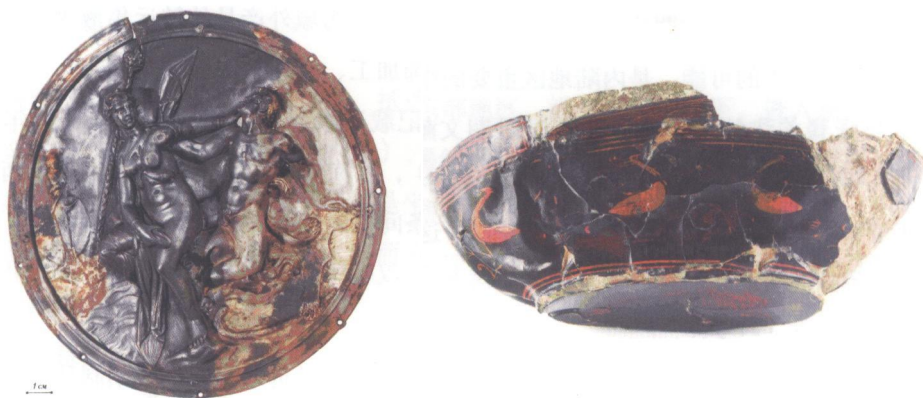
品的转运集散中心，还承担着作坊制作、再加工的可能，是内陆地区重要的串饰加工、供应地点。

汉武帝与张骞关注的古西南道在东汉时期文献记载逐渐显现。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永元九年（97年）以及安帝永宁元年（120年），西南掸国（今缅甸）国王经过西南道向汉廷通使请贡。^[81]由此看来，直至东汉时期，这条间接的古道被中原人所逐渐熟知，中南半岛北部与汉帝国西南部发展起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汉帝国开始沿着这条古老的商道开始与缅甸甚至更远的印度进行交往。

有关西南道的另外一项例证，即东汉时期通过西南地区贸易进入内地的琥珀制品。从质地的性状来看，考古学家们倾向于这些酒红色略显不透明的树脂化石的有机宝石，产地来源在云南南部哀牢山及缅甸地区。《后汉书》中说位于云南缅甸交接处的永昌郡特产琥珀原料。这些与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到东汉时期，之前所常见的一类色泽金黄透明的琥珀原料逐渐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半透明色泽更加红艳的品种。南部商人以更加经济的原料，替代了成本较高的远舶产品，有意思的是，内地消费者也欣然接受了这个现实。

朝鲜半岛以今平壤地区为中心的汉乐浪郡两汉墓葬里，曾发现为数不少的珠串饰和微雕，质地及造型都能在内陆找到相应的原型。汉武帝时期，通过对朝鲜半岛设郡向东拓展并加以管控，中国内陆和朝鲜半岛交流已为常态。通常陆路必须绕道辽东，而渤海湾的直线航运成为交流最便捷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汉帝国的军队也是通过海运从山东地区横跨渤海，自大同江入海口逆流而上抵达乐浪。不容忽视的是，乐浪汉墓中高等级贵族以王姓为主，而王姓又是山东（琅琊地区为中心）的豪族，这些墓葬的构筑方法和形制在大体上与山东地区相同，并在两汉时期保持相当长时间的同步性。由此可见，两地间通过以家构建起的血缘互动、以帝国政权管控的政治管辖、以及以贸易互通形成的网络，都全方位地促进了中国内陆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作为流行风尚的标示串饰与微雕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在蒙古高原发现的公元前后的匈奴墓中的串饰与微雕，表明匈奴族群也开始自觉或被动地受汉地风尚的左右。如果是早在两个世纪之前，长城以南的贵族间则是流行着以各类黄金饰品胡风时尚的另一番景象。这种大相径庭的原因与匈奴自身的分裂衰弱、西汉帝国对南匈奴的管控密不可分。在西汉晚期的元帝、成帝期间，匈奴单于通过纳贡表示臣服，从而获得南方帝国包括珍奇、丝织品、粮食等的丰厚赏赐。著名的诺彦乌拉墓地所发现精美的汉地丝绸、宫廷铭文的漆器，都表明很有可能是来自汉朝廷皇帝的礼物（图6-29）。这里发现的半宝石串饰与微雕，显然不同于同时期内陆西域所见（琉璃、蚀刻珠饰），反而与中国发现的相同，展现出东亚南北的文化渠道开始反向主动灌输。



a. 西方的文物

b. 东方的文物

图 6-29 2012 年诺彦乌拉匈奴墓葬出土的文物

中亚阿富汗“黄金之丘”M4中所见的琥珀卧兽微雕，无论是从料质、造型还是从工艺上来看，都是比较典型的西汉晚期汉帝国制作的微雕。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件微雕和另外一座墓葬出土的连弧纹铜镜均来自东部的汉帝国^[82]，但是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贸易尚存争议。实际上，我们不能忽视在公元前后匈奴在接受汉帝国丰厚的馈赠之后所做的经济行为。匈奴作为东西方贸易的直接参与者，通过马背上移动贩卖的经济模式，使得当今中亚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汉代漆器、铜镜以及少量玉器。正如近年来在南西伯利亚发掘的匈奴墓葬里，汉代的金银制品、丝绸、车马构件与希腊风格罗马银器并出^[83]，更形象地展示他们如使者般间接辅助了世界东西方的贸易交流。

从更大的时空来看，通过海路而来的各类串饰和微雕，汇聚于屹立东亚的两汉帝国并进行再改造，然后向东北部、北部地域辐射，在两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引领周边串饰品的潮流。不同于先秦时期以政权关系为主导的由北向南草原文化的风靡，西汉帝国开拓了以海上贸易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它较陆路更为便捷与迅速，构建起的联系也更为牢固和顺畅。